
文化生态视域下庐陵文化 形成流变及内涵特质的探讨

王健¹，顾筱和²¹

（1. 江西师范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330022；2. 南昌大学，江西南昌市 330058）

摘要：庐陵文化的形成、演变及内涵特质一直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试图从文化地理的角度探讨庐陵文化的起源与变迁。庐陵文化的形成既与庐陵三面环山、赣水中分、水系向心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同时，又与行政区域的长期稳定有关，区划的稳定有利于文化的沉淀和文化认同感的形成。西晋以来的多次移民，使得庐陵文化得以吸纳中原文化的养分而形成自身独特的文化体系。发展至今，庐陵文化逐渐形成了“崇文重教，耕读传世，尚武节义，宽厚包容”的文化特质，它既体现了平原文化的儒家色彩，又显示了山区文化的土著风格。庐陵文化是农耕经济中具有典型代表性意义的地域文化。加强该地区的文化生态保护建设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文化生态；庐陵文化；形成因素；流变；内涵特质；与现实文化关联

中图分类号：K90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558（2015）04-0095-07

引言

庐陵文化是在近几十年才为研究江西文化的学者提出的一个新概念，谁最早提出无从可考。因为没有权威学者论断，所以内涵纷繁皆有，众说纷纭——多为罗列文化现象，少有分析文化成因；多有阐述历史文化特征，少有探究现存文化关联。本人在此从文化地理文化生态学的角度，探知庐陵文化形成背景、发生发展流变与现实文化现象的关联一二，纯属一家之说，一管之见，非为论断，挂一漏万，敬请学界高师大德斧正。

一、影响庐陵文化形成的主要因素

独立单元的地域文化一般需具备两个要素，一是要有明显的区域文化中心，二是要有区别于它地的文化特质。庐陵文化形成与以下要素密切相关。

（一）地理环境

1. 水热和地形决定原生态稻作农耕经济文化

¹收稿日期：2015-07-10

作者简介：王健（1957-），男，江西高安人，江西师范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研究方向：中国文化地理。

古庐陵郡位于现在赣中西部，气候带属中亚热带，是典型的中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多年平均降水量在 1500 毫米以上，年均温约 18 度，无霜期长，四季分明，寒暑各半。雨量充沛，光热充足，适宜各类作物生长^[1]。

赣江从腹地穿过，东西南三面环山，随赣水北去而山势渐缓，形成吉泰盆地，武夷山脉、南岭、罗霄山脉成为吉泰盆地的天然屏障，抵挡了东南沿海的强暴风雨和西面寒流的侵蚀。吉泰盆地北面则一马平川，与鄱阳湖平原相连接。

水热充足，土沃水丰，地形优越的盆地环境，适应水稻生长，决定了当地的稻作农耕经济类型。这是当地文化的原生态根基或主干，其他所有文化现象都是由其派生、演替或接纳融合而来。换句话说，即使是蒙古人来了，这里也不会变成游牧经济类型的游牧文化。水热条件地理环境决定当地经济类型，即原生态文化根基。

2. 吉泰盆地向心水系利于文化聚集认同与传播扩散

吉泰盆地四面环山，中部地势平坦，赣江从中间穿流而过，赣江吉泰盆地两岸长度 50 公里以上的支流有十多条，左岸注入赣江的有皂口江、遂水、蜀前水、禾水、泸水、同江河，右岸注入赣江的有云亭江、富水、孤江、乌江，均匀分布于赣江东西两边。连接了几乎所有的古今县城和重镇。这些水系是沟通山区与平原的重要通道，平时承担着将山货运往平原及赣江边的庐陵郡治，同时又将其它生活用品运回山区的任务。表面上看上去水系仅是运输线，实际上它既是物质的运输线，又是文化的传播线。作为政治经济中心的郡治，必定承担着文化中心的角色。郡治文化中心的文化沿水随着来往过客人流而上，渗透到离文化中心更远的边远地区。另一方面，郡治通过行政管辖权行使受主流文化影响的政令，强力影响所辖地区，也包括盆地边缘的山区。这样自然形成一种由山区沿水系向平原文化核心地区的文化向心力。庐陵平原腹地广阔，山地高大绵延，平原文化与山地文化既有各自广阔发展空间又相互交融彼此影响，加上隋唐宋赣江黄金水道的繁荣和庐陵郡治的长期稳定，最终形成了庐陵文化的个性特质。由此，以庐陵郡治为核心的文化中心随之形成并稳固。

（二）政区沿革

1. 历史悠久形成文化自信

庐陵之称，始自秦初（公元前 221 年）设县，汉献帝兴平元年（194 年）置庐陵郡。隋开皇十年（590 年），改庐陵郡为吉州。后来庐陵一直以县名，直至民国初年。至今两千二百余年，历史悠久。古今名人以自称庐陵人为自豪。

2. 区域相对固定利于文化积淀

东汉献帝兴平元年（194 年）到隋开皇十年（590 年）置庐陵郡，至唐朝，其行政区划范围，北至清江，南至今万安、遂川。到北宋，吉州北部的清江、新淦、峡江划出。延续到元吉安路、明、清吉安府。直至 1952 年，新淦、峡江重新划吉安，1957 年改名新干。可见，从隋唐至今，庐陵行政区域长期保持稳定，只有北部新淦、峡江的进出。一个稳固的行政区域必定保持行政中心文化的持续影响，利于文化的积淀和文化特质的形成。

（三）人口迁移

1. 人口迁入带来北方文化

从西晋、中唐至两宋，来自北方和西北的游牧民族多次南侵，造成政治震荡，使全国的经济重心和文化重心南移，江西为中原人口的重要迁徙目的地。

西晋永嘉之乱，北方南下移民分东、西两线，西线移民越江到鄱阳湖流域，属江西北部。这次移民对庐陵地区影响不大。

唐中叶安史之乱，之后到唐下半叶，全国户口减少，独江西鄱阳湖、赣中地区户口大增，饶州、洪州、吉州户口增加尤多^[2]。

两宋几百年，尤其靖康之乱，大量移民进入吉州，“东北流移之人，布满江西”^[3]。

战乱导致中原人口的迁徙流入，有力地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不同地方流入的人口，把原籍的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产技艺带入了新的居住地。移民为了生存，为了后代的兴旺，必须抛弃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探寻适应时代需要的生存方式，这就从客观上为庐陵文化的形成提供了条件。

第一，引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迁入人口必须以有效的劳动获得所需的生活品。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人们不仅会把原籍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能提高劳动效率的工具制作技艺带入新居，还会不断地加以改进提高，以适应新的环境。庐陵一带的豆、麻、蔗、棉等农作物栽培技术和陶器烧造、纺织等技艺，追溯其源头，大多是随外来人口的迁入而传播的。

第二，继承了良好的传统。从外地迁入的居民，不忘祖辈艰苦奋斗、勤俭持家、崇尚礼义的传统，总会以此激励自己和教育后代，使中华民族的一些传统美德代代延续。尤其是忠孝节义等道德观念，不断强化，在庐陵大地生根开花。

第三，推动了教育的发展。为避战乱而入庐陵的人口中，有不少是北方的大族世家和书香门第。北方移民在避难期间，重视文化教育，兴办私塾，子弟多饱学之士。一旦社会安定，从乡间走出，进入科场，出仕为宦者，荣归故里，建宅修祠，光耀祖宗。

2. 人口迁出加强庐陵文化的辐射力并传播庐陵文化

五代、明、清，江西向湖广移民，“江西填湖广”^[4]“湖广填巴蜀”。主要是经济发达地区人口稠密，向地广人稀处的迁移。谭其骧先生在其《湖南人由来考》的结论里有以下关于江西的文字：“湖南人来自天下，江、浙、皖、闽、赣东方之人居其什九；江西一省又居东方之什九；而庐陵一道，南昌一府，又居江西之什九”。“江西人之来移湖南，大都以稼穡耕垦”。“江西南部之人大都移湖南南部，江西北部之人大都移湖南北部，而湖南南北部之分，以湘阴、平江作之界。”“南宋以前，移民之祖籍单纯，几尽是江西人”。“湖南人之祖先既大半皆系江西人。以是江西人之风习赋性，自为构成湖南人之风习赋性之主要分子。”^[5]湖南东南部多为吉州移民。导致江右商帮文化、万寿宫文化、语言文化的输出。“湖南东南部一片为赣客语区”^[6]。

二、庐陵文化发展演变

秦汉以前，庐陵一带的先民文化虽然还处于滥觞阶段，但整个说来，是和中原文化同步发展的。庐陵文化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五个时期。

（一）秦汉

秦汉时期是庐陵文化的初步开发时期。庐陵文化处于萌芽时期。

（二）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

这一时期是庐陵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时期。到东晋、南朝时期，庐陵文化得到中原文化的滋养，进一步繁荣。隋唐以后，随着人口的逐渐增加，庐陵经济文化也有了长足的发展：

第一，生产规模扩大，经济有较大的增长。《续搜神记》载：晋太元初庐陵郡巴丘县人名叫晁的，一家“年常田数十顷”，终以田作致巨富。可见，当时庐陵一带的农田，已得到较广泛的开发。这对地方经济的发展，无疑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第二，经济发展的同时，人口也大为增加。西晋时，庐陵郡有户数 12200 户（据《晋书·地理志》）；隋时，户数增至 23714 户（据《隋书·地理志》）；到了唐代，天宝年间户数便猛增至 37752 户（据《新唐书·地理志》）。人口的增加，标志着生产的发展。

第三，交通运输有较大的发展，以赣江为主要交通线的水上交通，得到了极大的开发。早在汉武帝时即已开通赣江航线达粤。唐代，赣江已成为通粤的主要交通线。开元四年（716 年），梅岭古道被拓宽后，中原入粤，主要经由赣江。这加速了庐陵文化和中原文化、岭南文化的交流，使庐陵文化迅速发展。

（三）宋明

宋明时期，庐陵文化的繁荣，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出现了一大批在全国有很高知名度的文人。宋代的欧阳修在古文、诗、词、赋、史学、目录学、金石学等领域，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此外像孔平仲、王庭兹、杨万里、文天祥等的诗，杨炎正、刘过、邓光荐、刘辰翁等的词，胡铨、周必大等的文，在全国也有很高的地位。元、明两代庐陵文化名人也很多，如解缙就是其中佼佼者。二是科举极盛。明代的郭子章称吉安“自洪武开科至于今，举人共二千八百有奇，进士共九百有奇，即与宇内文物剧郡颉之颃之，正足伯仲。然进士拜相者九人，尚书三十人，会元九人，鼎甲三十三人。有同朝三相者，有一年一相者，有一姓三元者，有一姓而十八进士者。……有一科而登进士至三十七人者，有一科而入翰林选庶吉士至十四人者，即他剧郡，亡有也。”

（四）清朝

进入清朝，庐陵文化渐趋衰微。燕王朱棣迁都北京后，全国的政治中心北移。明末清初，庐陵一带成了义军、明军、清军、乱军及三藩之乱联军的主要战场，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大批的爱国知识分子惨遭杀害。此外，清代中叶后，中国被迫开放通商口岸，千年来连接南北交通的赣江水道和大庾岭商路逐步冷落。庐陵地区失去了便利的交通条件，经济文化的发展开始停滞不前。清代庐陵文化名人寥寥可数，仅刘淑英、贺貽孙、李元鼎、李振裕、贺桂、龙科宝、刘绎、龙文彭、胡友兰等数人有些成就^[7]。

（五）现当代

民国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对赣中经济发展不利。经济区位边缘化，京广线和沿海南北通道远离赣中，导致经济衰退文化式微。

直到京九铁路、赣粤高速修通，井冈山红色旅游兴起，吉安地区经济又逢发展机遇出现新的起色。庐陵文化又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发展之势。庐陵文化与红色文化结合，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井冈山革命文化。

三、庐陵文化内涵特质

在研究和探讨吉安历史文化的时候，当地人和学者都习惯将庐陵故称以冠，我想有三层含义：一是始自秦初的历史久远性；二是当地古代名士皆以庐陵称故里的地名价值性；三是历史地域及文化边界的模糊性。故称之为庐陵文化而不称吉安文化。

本人认为：庐陵文化是指以历史上庐陵郡治为地理中心的，以赣中吉泰盆地地理单元为环境背景的，经过漫长社会历史变

迁、融合、积淀、发展而形成的，人们生产、生活、行为、思维等定式的总和。从另一个角度讲，庐陵文化是北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后，在南北文化交流、碰撞中，在赣江中游优越的区位优势条件和吉泰盆地良好的地理环境背景中，成长繁荣发展，并在宋代占据中国文化高地的极具特色的农耕地域文化。

庐陵文化的内涵丰富，难以面面俱到，在此主要概括具有明显特质的几个方面“耕读传世，崇文重教，尚武节义，宽厚包容”^[8]。

“耕读传世”是指庐陵人民勤于耕作，礼于诗书，耻于聚讼，以诗书求闻达，弃自守而进取的意识十分强烈。庐陵农耕经济发达，为读书提供了良好条件。北宋时期，京城的粮食主要靠江南提供，每年漕粮在 600 万石左右，江南西路 120 万石，吉州就占了近 40 万石；南宋偏安江南一隅，江西每年要为南宋王朝提供粮食 200 万石左右，占年供应量的 1/3，吉州又占江西的 1/3，约 60 万石左右。庐陵农业经济地位可见一斑。

庐陵人口密度大、人均耕地少。以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 年）为例，吉州府人口密度是江西平均人口密度的 1.54 倍，众多的人口为农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促使了农业的迅速发展。同时，人口的增长，资源的不足，也使得人们在农耕之外，必须寻求新的发展途径。在儒家思想的导引下，耕读并重，诗礼传家，以诗书求功名光宗耀祖逐渐成为时尚。“耕读传世”，积极进取，成为庐陵文化的基本特质。

“崇文重教”是指庐陵人民崇实达理，秀而能文，重视教育。庐陵地处内陆，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和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使得重农的思想根深蒂固，人们的商业意识比较淡泊。相反，在宋明理学的影响下，人们普遍重视教育，以教育作为修身齐家的重要手段，文化价值导向上偏重于“文化型”“学者型”“艺术型”。科举考中进士的多少，往往成为衡量一个地方文风是否昌盛，文化是否发达，人才是否众多，声望是否显扬的重要标志。从唐朝开科取士以来，庐陵先后出了 18 位状元（仅次于苏州），16 位榜眼，14 位探花，2969 位进士。庐陵历史上“兄状元，弟宰相”“父进士，子翰林”“三代同科”“兄弟连科”等科举佳话世代相传，崇文重教观念深入人心。

“尚武节义”是指庐陵人民犯颜敢谏，忠义节烈，山区住民习武成风。欧阳修、胡铨、文天祥、杨邦义、解缙、李时勉、刘球等，是庐陵先贤忠义节烈的杰出代表；还有不少清官、义士、烈女等，他们饱读诗书，受到“忠君报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儒家思想熏陶，都很讲忠义，讲气节^[9]。这种精神影响到庐陵的文风、士风以及民风，成为一种优良传统，代代相承。

庐陵以山地、丘陵为主，山地占全市面积 51%。艰苦的自然环境，使得永新、遂川、井冈山、安福等地山区住民坚韧不拔，习武强身，形成了浓厚的尚武习俗，这从永新的盾牌舞、井冈山全堂狮灯的流传可以明显感知。

“宽厚包容”是指庐陵文化宽大厚道、深沉浑厚的品格，宽容厚纳、博采众长的胸襟，以及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宏大气魄。庐陵人做事做人讲究“厚道”，在日常生活中重仁爱、讲友善，重情义、讲互助，重礼仪、讲孝敬，重诚信、讲承诺，重奉献、讲公益，重群体、讲谦让。古庐陵地理形态上山地绵延，平原广阔，河网密布，多样化的地理环境，频繁的人口迁徙、土客交融的人文环境，使得人们必须在求同存异的前提下，共同发展，和谐相处。因此，也就形成了庐陵文化宽厚包容的特质。在永新、安福、遂川这些山地与平原的交汇区域，这种特质尤为明显。

四、庐陵文化与现实文化的关联

从唐代至今，庐陵行政区域长期保持稳定，这十分有利于区域内文化交流、融合，对于当地特有的文化氛围和文化体系的形成具有积极的作用，也容易在此基础上形成文化上和空间上的向心力。以庐陵郡治（今吉安市区）为文化和地理中心，形成了高度的文化认同感。

从地理环境上看，庐陵文化生态空间跨越了平原、河谷、丘陵、山地，成为平原文化、山地文化、河谷文化交相融汇的区域，使其文化形式既有平原的安逸、儒雅、淡泊、诗书气，又有山区的淳朴、包容、彪悍、豪迈气，以及河谷地带的干练、敏锐、诚信、精明气，成为多样化色彩非常明显而又相互兼容、自成一体的独特文化区域。这种特定的地理空间结构，也使庐陵文化与周边地域文化相比，有着很不一样的气质。

庐陵文化生态体系完整，内涵丰富、传承有序，代表庐陵文化重要特质的耕读、崇文、习武、节义、包容等不仅有完整的精神内涵，而且有众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载体，并一直存续至今，成为庐陵文化生态的重要表征。

庐陵历来农业发达，吉泰盆地是江西最重要的产粮区域之一，许多与农耕文明密切相关的民俗活动至今活跃于民间。如“青原箍俚龙”“泰和虾蚣灯”“万安麒麟狮象灯”“峡江打蚌壳”“安福吃新节”等。“峡江打蚌壳”始于明朝，距今约四五百年。起源于当地流传的一个古老而美丽的《蚌壳仙子》传说，表达了人们向往幸福生活、祈盼赣江水面平静无水患、年年五谷丰登、人畜平安的美好意愿；再如“安福吃新节”，是当地百姓在割稻之前，采集新谷制作祭品，祭庙、祭祖、游村、游田垌、吃新、举火把、唱山歌、开镰收割等系列庆典活动的总称。

庐陵崇文重教蔚然成风，自古皆然。“文天祥故事”“欧阳修故事”“解缙故事”“杨万里故事”“陶母教子故事”长期在民间流传，人物故事鲜活，群众基础广泛，成为历代庐陵百姓学习、效仿的榜样，崇文重教观念深深融入庐陵文化的潜意识。此外，“吉安白鹭洲故事”“吉水长龙”分别表达了人们对书院的重视和对读书人的崇拜。“永新书法”则是崇文理念在人们行为上的直接表现。

庐陵山区艰苦的环境造就了习武习俗。“永新盾牌舞”“井冈山全堂狮灯”“安福表嫂茶习俗”“吉安东园龙”“泰和华盖双狮舞”是习武习俗的直接表征。“永新盾牌舞”源于南塘村一带山水资源的争夺。吉安县永阳镇东园村舞龙习俗始于南宋开禧年间，已有 800 年以上的悠久历史。尚武而又极富创新精神的东园村人，将武术、杂技等融入龙灯表演中，自创了“架天桥”“架地桥”“仰倒牌”“迭腕站”“登高台”等难度极高的精美花节，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吉安东园龙”。

庐陵道教文化历史悠久，至今仍然在人们的生活中产生着重要影响。“青原喊船”“永丰傩舞”“峡江玉笥山传说”“安福武功山传说”“安福火腿制作技艺”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都与道教文化密切相关。“青原喊船”也叫请神送神，意为恭迎从洛阳乘坐神船龙舟而来的众神，以各种形式热情款待，隆重祭祀供奉，并将赞美之词和心中祈愿以连续多日的演唱倾诉，恳请众神在享受香火贡献和娱乐的同时，为百姓驱邪除魔保平安。“安福火腿”的诞生与楚地巫风以及道教胜地武功山紧密相关。楚地盛行“疾病不（求）医，唯槌牛祭鬼”。而敬鬼神需献供品，其中少不了猪蹄“肥肉”。“肥肉”是供神之品，人们相信吃了“肥肉”能消灾除祸。为求保存更长时间，一时吃不完的“肥肉”挂在灶前熏燎，和上食盐腌制起来，历代改进、完善，成为今天的“安福火腿制作技艺”。

任何文化都不是孤立存在的，社会的政治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都会对原生态文化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会强化原生文化的特质，也可能消融原生文化的个性。庐陵文化生态处在中国当代社会政治、经济、人文环境巨变的大环境下，必然也会带上时代的印痕。

庐陵文化的上述内涵与特质，对井冈山精神的形成和红色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10]。正因为耕读传世，才能够为革命提供必要的物质支持；正因为崇文重教，才为革命提供了大量才智之士；正因为尚武节义，才为革命提供了大量有气节、有风骨的战士；正因为宽厚包容，才容易接受来自于外部的革命文化。

五、结语

庐陵文化是以农耕经济为基础，以文章节义为核心特质，以多种文化包容共存为特色的江西地域文化。从历史文化的角度

审视，她在宋明时期曾经占据中国文化的制高点，引领华夏文坛风范；从现当代文化的角度审视，她是中国革命星星之火依托的文化生态环境，孕育了伟大的井冈山精神。以此推论：庐陵文化是农耕经济中具有典型代表性意义的地域文化。加强地区的文化生态保护建设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1]江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江西自然地理志[M]. 北京: 北京方志出版社, 2003.
- [2]《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五》.
- [3]李纲. 《梁溪集》卷 101《条具防冬利害事件奏状》.
- [4]魏源. 《古微堂内外集》卷六《湖广水利论》.
- [5]谭其骧. 湖南人由来考[J]. 方志月刊, 1933, 6 (9)
- [6]周振鹏. 游汝杰. 湖南方言区画及其历史背景[J]. 方言, 1985 (4) .
- [7]龙霖. 论庐陵文化[J]. 吉安师专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1995, 11 (增刊) .
- [8]王健. 顾筱和. 庐陵文化生态保护区规划纲要[R]. 吉安市人民政府. 江西省文化厅, 2014. 12.
- [9]吕滨. 庐陵文化的渊源、特点与历史地位[J]. 江西社会科学, 2001 (5) .
- [10]陈忠志. 略谈庐陵文化对井冈山精神形成的影响[J]. 党史文苑, 2012 (3).